

从《桐旧集》到《耆旧传》

许 结

从十八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叶,桐城文派的影响以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寰中任何一个区域无与比肩的,而作为文派的记忆,又依靠乡梓文献存留,考诸桐城历史文献,则以马其昶《桐城耆旧传》^①(以下简称《耆旧传》)与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最为著称。然两书相较,刘编宽泛,广罗旁搜,已溢出桐城区域学术之限囿,而马编谨肃,能落实于桐城家族历史文化,兼明师承传统,故为学界所重,堪称一部典范的桐城学术史著。然《耆旧传》的编撰,虽有编者“自序”说明,至于文献来源,却语焉未详。近读桐城先贤徐璈所编桐城诗歌总集《桐旧集》,观其收录范围、编纂方法、诗人小传等,《耆旧传》多与之同,因作一比对,考述异同,以揭示桐城文献传承之一线索。

一、《耆旧传》编纂之文献渊源

《耆旧传》的编纂,据编者自序“计初草创,至今逾岁廿”(《自序二》),即经历二十余年而后成。考是书初成于光绪十二年(1886)春,编者自诩桐城“两朝之学术风趋,盛衰得失之林,亦略具于此”(《自序》),时人毛庆蕃于光绪丁亥(1887)为是书《题辞》云“桐城文献名邦,号天下第一,得通伯网罗放佚,都为一编”,可见已成规模。继此,编者又历经多年拾掇补遗,即《自序二》所说“今馆中多暇,乃锐意取前稿重修之”,于光绪三十三年复记其成,翌年春,编者再撰《自序三》,所言“重编目次”,终成其著。从编者相距二十二年(1886-1908)的三篇《自序》所述之经历,已明其成书历程,如果从其《自序二》所言“其昶少有志乡邦文献”来看,其编撰过程更长,即从编者青少年时代一直到知天命之年,堪称其一生中历时最长的一部著述。推究其因,除了桐城文献散失需大力搜罗外,就是编者整理乡邦文献的使命意识,而这又与其家世有关。

马其昶(1855-1930),字通伯,晚号抱润翁,自著文集有《抱润轩文集》、《续集》等。马氏乃桐城马姓之一(另有马宪、马教思等),是为望族,其先祖马

^①马其昶著、毛伯舟点注:《桐城耆旧传》,黄山书社,1990年。下文引用该书,不再一一注明。

孟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官至太仆寺卿,至清代,汉学家马宗琏、以治毛诗著称于时的考据家马瑞辰,皆为其同宗族祖。其祖父马树章,官至太常寺典簿,父马起升,议叙同知,皆名闻乡里。而对马氏熟悉乡梓文献且立志编撰《耆旧传》影响最大的,当推其伯祖马树华。马树华(1786—1853),字公实,号筱涓,又号怀亭,嘉庆十二年(1807)贡生,官汝宁府汝南通判。咸丰三年(1853)避洪、杨之乱居乡,被乱兵杀害。据方宗诚《马公实传》载:“君著书甚多,不肯校刊,惧先世遗书散佚,乃辑《马氏诗钞》七十卷、《太仆奏略》四卷、《翊翊斋遗书》四卷、《岭南随笔》三卷。”^①此外,马树华于整理桐城乡邦文献贡献最大的尚有二事,一是《龙眠识略》之辑,一是参与编撰《桐旧集》的工作。对前者,马其昶在《耆旧传》的《自序一》中略有记述:“曩者,先伯祖通判公尝有《龙眠识略》之辑,遭乱亡佚。”正因《龙眠识略》亡佚,《耆旧传》或为编者继先志之学,且马树华热衷乡邦文献的整理,家藏相关书籍丰厚,这也许又是马其昶“少有志乡邦文献”的条件。至于其他书籍,马其昶仅谓“郡县书又率伤冗繁”,所以他是“广徵载籍,会粹旧闻”(《自序一》)、“发前所集采传记、公私谱牒盈篋筒”(《自序二》),而对其先伯祖参与的第二项有功于乡邦文献的工作《桐旧集》的编纂,则未提及,这正是本文要质疑与发覆之处。

桐城文献之邦,早在明代后期,方学渐就撰有《桐彝》、《迳训》记述桐城先哲芳规懿迹^②,后继整理传播者亦屡世未绝,然其“遭乱亡佚”,实缘于两次兵燹。一次是明崇祯八年到十五年,李(自成)、张(献忠)所部入桐城,大量明前文献被毁,故戴名世有《予遗录》之撰^③。另一次是清咸丰三年洪(秀全)、杨(秀清)兵犯桐邑,乡梓文献遭乱,丧失严重,其中就包括编撰于道、咸年间的《龙眠丛书》(光聪谱编)与《龙眠识略》。经此两度大乱,较完整的桐城历史文献大量丧失,但却有两部诗歌总集保存至今,即潘江编辑的《龙眠风雅》和徐璈编辑的《桐旧集》,成为后世整理桐城文献的重要取资。

有关《龙眠风雅》,其主编者潘江(同编者有方授、钱澄之、姚文燮)^④,康熙十八年以博学鸿儒荐,以母老辞,后两徵遗逸不就,为典型的清初遗民。而其书今入《四库禁毁书丛刊》^⑤,内收桐城明人诗作,少量顺、康(初年)亡故遗老作品与身世。《耆旧传》编纂时对此书有否取资,结论是否定的。因为马氏编

①方宗诚:《马公实传》,《柏堂集》卷九四,光绪六年刻本。

②姚永朴《桐城耆旧言行录序》:“昔明善先生尝撰《桐彝》、《迳训》两书,虽所收录甚简,然吾邑正、嘉以前之文献,实赖是而仅存。”(民国六年石印本《蜕私轩集》卷二)

③王树民编校:《戴名世集》卷十二《予遗录》(附灾异记),中华书局,1986年,第309页。

④潘江《龙眠风雅·凡例》:“予于戊午秋曾与方子子留有志兹选……庚子、辛丑之间,钱子饮光、姚子经三慨然共事,乃尽以夙藏,倾箱倒庋,而沮于异议,未观厥成……曩与方子子留首倡斯举,颜曰《龙眠明诗选》,仅撮前代,不列今朝。钱、姚二子又广综已逝,采及时流。”

⑤《四库禁毁书丛刊》景印康熙十七年石经斋刻本。

《耆旧集》仅谓“《龙眠风雅·古文》一集犹幸有传本”，而于潘江编撰之作，包括《龙眠风雅》六十八卷、《桐城乡贤实录》一卷，则“均佚”（《耆旧传·潘木厓先生传第七十六》）。其实，早在道光年间徐璈编辑《桐旧集》时就已说《龙眠风雅》“湮落无可收拾”。而马树华《桐旧集序》亦谓“潘氏选本，已不复存”。直到民国年间光云锦撰《景印桐旧集识语》还认为潘编“久伤残佚”。可见自清中至民初，桐城文人均未见《龙眠风雅》全帙。勘究其原因，桐城前贤多谓雕板毁蚀或毁于兵火，其中回避了一个史实，即康熙五十年左御史赵申乔参奏“桐城方戴两家书案”（即《南山集》案）^①，使此书被四库馆臣列于“禁毁”，以致桐城坊间已绝流传。

与《龙眠风雅》不同，《桐旧集》于桐城历史文献与文学史料具有取资价值^②。这首先在时间跨度上，《桐旧集》较《龙眠风雅》增添了“自康熙迄今（指咸丰初，实道光末）又百余年，名辈益众”（徐璈《桐旧集引》）的诗人诗作，且增有传记与评点。其次，《桐旧集》是迄今桐城人自编桐城文献中保留文人传记最多的一部书，比较萧穆所编《桐城文徵》仅收230余家，其千馀家之数，更受乡贤宿儒的重视。其三，是书虽遭受咸丰三年桐城兵燹之厄，但始终有家藏本流传于坊间，未曾断绝。当然，更重要的是《桐旧集》的编纂也堪称马氏家学，这不仅在于徐璈编是书时取资马树华的《龙眠识略》，而且马树华就是使《桐旧集》得以完成的重要人物，这也增加了《耆旧传》文献取源于《桐旧集》的可能性。

对《桐旧集》的编纂与成书，马其昶《耆旧传》卷十《徐阳城传》记述徐璈（1779—1841）“选乡先辈诗为《桐旧集》四十二卷，皆刊行”^③，又谓：“《桐旧集》刊未半而阳城卒，先通判公续成之。”徐璈在《桐旧集·例言》中也曾称述：“此编成书篇卷颇繁，搜辑校订赖同年马君公实之力为多。”可知马树华于此书的工作，已不限于续成，而是参与。璈侄徐寅《桐旧集跋》也有一段文字记述：“（是书）实吾邑文献攸关，惜仅刊刻三分之一，辛丑春叔遽捐馆舍，事遂寢息。己酉秋弟裕归自吴门，每与寅商榷，思续成其事，弟昆亦邮书问讯。明年夏，谂请方植之、马元伯、光律原、姚石甫、马公实诸丈，为之筹画，蒙慨然资助，遂续剞劂。凡计论雠校，公实丈暨表弟苏厚子之功实多。”此间所言苏厚子，即苏惇元（1801—1857），字厚子，号钦斋，徐璈外甥，方东树弟子，然其助力完成《桐旧集》编纂工作时，正客馆授徒于马树华家中，故苏氏自谓马树华不仅“为之劝

①关于潘江与“桐城方戴两家书案”主角方孝标、戴名世的关系，以及《龙眠风雅》被禁毁之因，详见拙文《〈桐旧集〉与桐城诗学》，载程章灿编：《中国古代文学文献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526页。

②本文所引《桐旧集》为丁卯（民国十六年）九月影印原刻本。

③有关徐璈生平事迹，尚见《仪卫轩文集》卷十一、《考槃集文录》卷十、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以及《桐城县志》、《续碑传集》、《皇朝经世文续编》等。

募醵资续刻”，且“总其事”，而自己授徒其家，“相与商订校勘”，才完成此“吾邑文献所关为不可少之书”^①。由此可见，《桐旧集》是草创于徐氏而成就于马氏的。然该书编成两年后，即遭兵祸毁板，而经七十六年后的民国十六年（1927）光云锦将自藏残本与方守敦藏本合印时，于其《识语》中有段话耐人寻味。光氏继“遭洪、杨钜劫，板片遂毁，书亦散失”后云：“盖存者率残缺不完，间有全者，又或以独得自矜，不肯公诸于世。”^②此说“独得自矜”是泛指还是有所专指，已不可考，但作为家学传承的马氏藏书，存有全帙《桐旧集》的可能性极大，当然，推测《耆旧传》文献取资《桐旧集》，还需比对参考，方能得其大概。

二、以家族为中心的桐城文献辑录

如果说马其昶《耆旧传》取资《桐旧集》而又未明言，有两种可能，一是如光云锦所说“独得自矜”，私藏取资；二是如马氏白云，《桐旧集》也属于那种“率伤冗繁”（《耆旧传·自序二》）之编，不足取法。如果说马氏编《耆旧传》时未曾见过《桐旧集》，则又与其家学相违，而两书相近相类之处甚多，实难以回避。

夷考两书编纂主旨，虽一为诗集，一为史著，然其间最相似者即以家族为中心辑录桐城文献。两书对乡邦文献的保存，首先在其选录的广泛性。从时间上来看，《桐旧集》辑录诗人及作品纵贯明清两朝（至道光末年），《耆旧传》也是辑录两朝乡邦文献，仅增加自道光后期至清末约六十年的部分人物事迹。而从空间上来看，两书都是以家族姓氏为中心的编录方法。《桐旧集》全编前四十卷广采邑中八十五姓诗人一千二百余人、诗作七千余首^③。其八十五姓分别是（依出现顺序）：

方、姚、陈、谢、章、邱、盛、袁、余、钱、齐、吴、江、汪、阮、秦、林、萧、何、赵、丁、戴、胡、张、马、刘、左、叶、倪、周、李、侯、童、范、邓、高、殷、王、程、朱、杨、光、夏、唐、潘、石、曹、孙、徐、彭、白、都、蒋、陶、苏、鲍、郑、祝、曾、严、董、臧、厉、项、柏、杜、许、金、疏、施、魏、陆、谈、钟、顾、邹、梁、史、任、崔、乔、雷、储、龙、文。

桐中姓氏，大体均已涵盖。《耆旧传》辑录五十九姓，其中《桐旧集》有而《耆旧传》缺者有三十三姓，分别是：

袁、秦、丁、侯、范、高、殷、石、都、陶、鲍、祝、曾、严、臧、厉、项、柏、杜、施、魏、陆、谈、钟、顾、邹、梁、史、任、崔、乔、储、文。

其与《桐旧集》相同者五十二姓，又有七姓《耆旧传》有而《桐旧集》无，分别是：黄、韩、檀、璩、尹、笪、朴。

①苏惇元：《校刊〈桐旧集〉后序》，《桐旧集》原刻本卷首。

②《桐旧集》卷末附光云锦《景印〈桐旧集〉识语》。

③据笔者统计，《桐旧集》收诗人 1262，诗作 7704，另附初编者徐璩 1 人 96 首，共计 1263 人 7800 首。

值得注意的是，像《桐旧集》这样的乡邑文学总集（或选本），在突出望族地位的同时，又要关注各族姓的地位与平衡，所以往往选录广泛，也因此尝遭轻抑。例如潘江编《龙眠风雅》即受到当时操严选之论者的批评，方孝标则为之辩护云：“凡选宜严，此选宜宽，盖凡选主规模，此选主表章也。”^①《桐旧集》之选也是“表章”乡贤诗学成就，所以也是“宜宽”。然而马氏编撰《耆旧传》，欲效史迁、班固“遗法”，传千年不朽之史^②，则宜严而不宜宽。但观其取姓五十九，取人近千人，以一邑之广，亦可见其取材宽泛。这其间自有“表章”之意，也是一种乡邦文献传承的力量。《耆旧传》取法《桐旧集》，更突出表现在对乡梓望族的“表章”方面。所不同者，《桐旧集》仿效王豫《江苏诗徵》的编纂方法^③，采取选录人数与作品的多少以及小传的详略区分主次，《耆旧传》原本仿效阮元编《清史列传·儒林传》的体例，后略变其制，采用“主传”与“附传”的形式以及传文的多少分其主次^④。

桐城望族，尤其是文学世家，以“方”、“姚”、“吴”、“马”四族为最。两书皆用“姓氏”分卷法，其对望族表彰的排序及程度，几乎相同。仅以前揭四族为例，《桐旧集》四族共计421人，占全书三分之一；《耆旧传》主传123篇，四姓共计49篇，占全书三分之一强。具体到每族，方姓：《桐旧集》选录142人，《耆旧传》选录103人，其中同录者53人；姚姓：《桐旧集》选录99人，《耆旧传》选录73人，其中同录者41人；吴姓：《桐旧集》选录110人，《耆旧传》选录59人，其中同录者34人；马姓：《桐旧集》选录70人，《耆旧传》选录50人，其中同录者28人。如果我们减去《耆旧传》中自道光至宣统近六十年的人选（约占四分之一），则两书同录者人数几乎占有四分之三。兹依《耆旧传》人物顺序，抄录两书中“四姓”同录人物名于次：

方法、方佑、方效、方向、方玺、方见、方印、方克、方学渐、方大铤、方大钦、方若洙、方大美、方授、方象乾、方帜、方戡、方大镇、方大任、方孔炤、方以智、方其义、方中发、方孔时、方颢、方中通、方中德、方中履、方正璆、方正璠、方正玠、方正瑗、方张登、方赐豪、方文、方贞观、方世举、方拱乾、方亨威、方育盛、方膏茂、方苞、方式济、方兆及、方登峰、方观承、方观永、方维甸、方受畴、方曾祐、方元醴、方泽、方绩。

①方孝标：《与潘木厓书》，《龙眠风雅》卷首。

②马氏《耆旧传·自序二》：“余维传记之作，必归诸驯雅。窃取迁、固之遗法，始足表扬盛美，诱迪方来，因不自揆，著为此编。”

③《桐旧集·例言》：“是编……仿《江苏诗徵》之例，分姓列卷，其间略以时代之先后为序。”按：《江苏诗徵》由清嘉道间王豫编辑，稍早于《桐旧集》问世。

④《桐城耆旧传·自序三》：“曩吾为此传，用阮文达公拟国史《儒林传》例，采掇旧文，悉注所出。尝侍吴（汝纶）先生，语及之，先生曰：‘此百衲衣也，宁复有佳文乎？且所贵立言君子者，为其有鉴裁孤识，安见出于人者必可徵……’自是遂翻然改图……重编目次。”按：所言国史《儒林传》之编，详参阮元《经室一集》卷二《拟国史儒林传序》。

姚旭、姚昱、姚希颜、姚希廉、姚自虞、姚之骐、姚之兰、姚孙林、姚孙斐、姚文烈、姚文勋、姚文鳌、姚文燕、姚士圭、姚康、姚文然、姚文燮、姚孙森、姚士薰、姚文熊、姚孙渠、姚士陞、姚兴泉、姚文焱、姚孙炳、姚孔铎、姚孔铨、姚孔铤、姚兴茶、姚孙枝、姚士基、姚士堂、姚士坚、姚孔鏞、姚范、姚铃、姚兴洁、姚菜、姚覲闻、姚鼎、姚原绶。

吴橄、吴自峒、吴绍志、吴一介、吴道新、吴道约、吴应宾、吴道凝、吴用先、吴日昶、吴应琦、吴用轸、吴用铭、吴国琦、吴宏安、吴德操、吴子云、吴贻咏、吴直、吴自高、吴逢圣、吴中兰、吴中芝、吴缪、吴逢盛、吴士庸、吴询、吴向晨、吴廷焯、吴隆鹭、吴贻诚、吴赓枚、吴云骧、吴孙珽。

马孟祜、马懋功、马之瑛、马之琮、马之瑜、马国志、马庶、马教思、马敬思、马孝思、马继融、马日思、马凤翥、马书思、马元文、马源、马方思、马潜、马翻飞、马鸣鸾、马鹏飞、马鼎梅、马春生、马春田、马宗珪、马棠臣、马泽、马维璜。

依此所列，桐城在道光前之“四姓”名流，大抵全收，而《耆旧传》所录“四姓”未见于《桐旧集》者，方姓 50 人、姚姓 32 人、吴姓 25 人、马姓 22 人，其中过半属于《桐旧集》成书后补录乡邑名贤。而在同时段（明至清道光前）《桐旧集》所收而《耆旧传》未收者，多系有少量诗作流传，然无甚影响者；同样，《耆旧传》所收而未见于《桐旧集》者，则主要决定于“诗集”本身，即没有诗作流传的人物。

除了两书大量的同录人物及其传记内容相类，推测《耆旧传》于《桐旧集》的承继，还可以从两书的体例与内涵，观其内在的联系。这主要表现为“首取”、“名家”与“家族文献”三方面。

合观两书诸姓，首取人物多数相同，而不同者也因《耆旧传》首取之人无诗，故不见载《桐旧集》。以“四姓”为例，仅“马姓”《耆旧传》首取“马宪”无诗，故《桐旧集》首取“马孟祜”，其他三姓首取“方法”、“姚昱、姚旭”父子、“吴橄”，两书尽同。例如“方法”，《桐旧集》诗前小传载：“字伯通，建文己卯举人，官至四川都司断事。靖难殉节死。”具体史实，小传分别引录《明史·方孝孺传》、《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幽忠录》等文献，详细记述了方法的一生行事，以及桐城方氏追述其“忠节”的意义^①。《耆旧传》记述方法一段百馀字，亦取资上引文献，基本内容与《桐旧集》同。两书首取“方法”的意义，就在前引小传所言“靖难殉节”，而《耆旧传》中《方断事传》承其意，在“马其昶曰”中加以标举：“悲哉，靖难之事！正学不肯草诏，赤十族，公以小臣，亦不肯署表死，大节不夺，殆无愧哉！”^②此以方法附义于方孝孺，首取之例所包涵的思想意义，成为桐城方氏一族尊奉的精神风范，这到明末“方学渐”至“方以智”一宗数代，尤为显彰。

^①徐璈等编：《桐旧集》卷一《方法传》。

^②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卷一《方断事传第三》。

《耆旧传》因其体例,分有“主传”与“附传”,其中包括子“主”而父“附”,论其义例,则在人物显赫与否,亦即“名家”。在《耆旧传》中,如“方姓”103人,而列作“主传”仅20人;“姚姓”73人,列作“主传”仅13人;“吴姓”59人,列作“主传”仅8人;“马姓”50人,而列作“主传”亦8人。以“吴姓”为例,其列为“主传”者分别是:吴檄、吴一介、吴应宾、吴用先、吴德操、吴廷辉、吴询、吴汝纶。对照《桐旧集》,吴姓8人中除吴汝纶为晚清人,余7人皆列其中。再如“姚姓”,“主传”有:姚旭、姚希廉、姚之骐、姚孙斐、姚康、姚文然、姚文燮、姚士基、姚范、姚兴洁、姚鼎、姚元之、姚莹。其中除了姚莹资助和参与《桐旧集》的编纂而未列入,其他12人尽在其中。两书皆取“名家”,但因体例不同,各有偏胜,《耆旧传》表明于“主传”,《桐旧集》则一在收录诗作的多少,更突出表现于“小传”的繁简。例如《桐旧集》因时列人,故姚显、姚旭父子顺序排名,然其小传,则姚显“简”而姚旭“繁”,其介绍姚旭除了生平事迹介绍,还引述《明诗综》、《姚氏先德传》等文献,以丰其意蕴。《耆旧传》则以姚显附传姚旭,其主传人物的介绍文字虽多,主要内容也与《桐旧集》相同,有明显的取资迹象^①。又如吴檄,明进士出身(正德辛巳进士),《桐旧集》的小传大量引述文献,包括《明诗综》、《江南通志》、方学渐《迩训》、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天一阁书目》等,极为详尽。而对另一位明进士(嘉靖壬戌)吴自嗣,虽也引述郡志及《迩训》的记述,但较前者简略很多。对照《耆旧传》,前为“主传”,后入“附传”,详略完全同于《桐旧集》^②。

由于两书均以“姓氏”分目列传,所以其承继传统重在“家族文献”,《耆旧传》于此是取效《桐旧集》的。《桐旧集》虽是一部诗总集,然其辑录诗家的本事资料,既强化了诗史的性质,也为桐城乡邑保存或汇集了不少史料文献,其作用甚至超过《耆旧传》。例如书中卷二《方仲舒小传》附有戴名世撰方氏诗集序与其子方苞的跋遗诗文,使仲舒之诗与本事,了然可睹。戴名世云:“逸巢先生有二才子,曰舟,曰苞,皆工为文章,一落笔辄名天下,而先生工为有韵之言,跌宕淋漓,雄浑悲壮,有古诗人之风。”^③方苞云:“先君子自成童,即弃时文之学,好言诗。少时耕牧枞阳黄华,有《江上集》;既而迁六合,有《棠村集》;康熙甲寅还金陵旧居,有《爱庐集》。”^④《耆旧传》于方仲舒未立传,其好为诗仅见于《方望溪先生传》中,“父讳仲舒,号逸巢,国子监生,与黄

① 详见《桐旧集》卷五《姚显传》、《桐城耆旧传》卷一《姚参政传第六》附姚显。

② 按:《桐城耆旧传》共十二卷,末卷《列女》附,前十一卷皆人物传。卷次分主传与附传,例如卷一《方断事传第三》以方法为主传,吴名扬、杜万户、詹大刀、赵景初则为附传;又如卷一《方桂林、琼州传第七》,则以方佑、方向并为主传,方效、方玺、方舟、方见为附传,倘区分方佑、方向,又可视前者为主传,后者为次传。

③ 戴名世:《方逸巢先生诗序》,《戴名世集》卷二。

④ 方苞:《跋先君子遗诗》,《方苞集·集外文》卷四。

冈杜茶村兄弟、同县钱饮光友善。著诗三千余篇。”虽然言词简略,其与《桐旧集》小传亦相类。至于桐城姚姓,《耆旧传》在《姚休那传》中列举三族:“姚先生讳康,字休那,原名士晋。先世自婺源迁居桐城白苓洞——桐城之姚族有三,曰麻溪,曰苓洞,曰官庄,先生苓洞姚氏也。”^①有关姚康(休那)先世,详见姚鼐所撰《姚休那先生墓表》,其云“休那先生之先世,自婺源迁桐城白苓里,是为白苓姚氏”^②。而《耆旧传》所列姚康生平事迹,如与何如宠的关系,以及明末居乱著述等,不仅取自惜抱此文,且更与《桐旧集》相近。考《桐旧集》卷五《姚康小传》,引录文献除前揭姚鼐文,尚有吴道轼《姚休那寿序》、方以智《货殖传题词》^③、潘江《龙眠风雅》以及郡志等,其为人处事,著述行状,最为详明,对读两书记述,其间对桐城家族文献的关注以及其相承关系,是非常明确的。

三、以方姓为例考述文献传承与补益

姚永朴在《桐城耆旧言行录序》中记述方学渐撰《桐彝》、《迩训》,明朝正、嘉以前乡邑文献得以保存,而于其后则云:“予每与马君通伯言此,未尝不思所以赓续之者。乙酉秋,通伯既撰《耆旧传》若干卷,予乃本朱子意,遍采史传志乘,及诸家文集笔记,别为言行录一书……传所取之人为详,而事则非其大者不载;是录所取之事为博,而人则非其大者亦不载。”姚撰“言行录”取事博则取人少,而谓马撰《耆旧传》取人详而取事略,故马书更具传记体的史料价值;然姚永朴谓继方学渐《桐彝》明正、嘉后乡邑文献仅赖马“传”,或就乡邑史著而言,而以其他形式保留之文献著述则付阙如^④。就取人而言,《桐旧集》人物小传记载了大量的自明正、嘉至清嘉、道的桐城人事,而为论者疏略,观其取人之数及事之详略,显然对《耆旧传》有很大的影响。

兹以方姓为例,试述其文献的传承与补益。

(一)两传(《桐旧集》小传与《耆旧传》,以下分称“前传”、“后传”)记人皆详,而内容基本相同者,如方法、方学渐、方大任、方孔炤、方若洙、方颢、方以智、方授等人物传。例如方孔炤为方以智父,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官至巡抚,然生平坎坷,早年因忤崔呈秀而削籍,晚岁平张献忠之乱失利,遭劾下狱,被桐城乡中奉为忠贞之士。前传先叙本事:“字潜夫,号仁植,万历丙辰进士,官湖广巡抚,有中丞公集。”继而引述《明诗综系传》、《明史·郑崇俭传》、

①《桐城耆旧传》卷六《姚休那、白靖识、方羽南、邓颠崖、陈朗生传第六十三》。

②姚鼐:《姚休那先生墓表》,《惜抱轩文集后集》卷六。按:姚鼐一族为麻溪姚氏,先世由徐姚迁入桐城。

③按:姚康曾评《货殖传》。马其祖《耆旧传·姚休那传》载:“又尝评《货殖传》,皆刊行。”

④桐城乡邑文献之保存,除了大量的文人别集和作家年谱,还有诗文总集值得注意,如萧穆编《桐城文徵》、方宗诚编《桐城文录》,方昌翰编《方氏七代诗钞》、马树华编《桐城马氏诗钞》等。

《江南通志》、余颙《方中丞集序》、钱澄之《祭方贞述公文》、方中履《中丞公集跋》、《明史·艺文志》等文献，对方氏的生平、事迹、著述有详尽的记述，而重点则在其抗击流寇，失机下狱之情状^①。后传则分五节文字记述方氏一生，先述学业与官职，次述忤逆阉削籍，次插叙丁忧庐居一段，再以重点笔墨记述巡抚湖广以及抗贼失机下狱事，末述平生著述。对照两传，体例有异，而内容尽同，其中一些生动描述，如后传所写“公所部号万人，备多力分，骑兵不及十一。击贼李万庆等于承天，八战皆捷”、“公乃独率麾下千余人，疾驰抵竹山”两段描写^②，即与前传所引方中履《中丞公集跋》所言“士卒无不愿为公死，故麾下仅三千人，骑兵不及十一，乃能以寡击众，八战皆破贼”，其语言、事情、趣味均相类。虽然前传以辑录文献为主，后传以描述事相为文，但从大量传记的相类相似，其文献的传承则是明显的。

(二)前传记述详而后传略者，如方文、方大铉、方孔时、方拱乾、方其义、方亨咸、方仲履、方贞观、方世举、方泽等人物传。两传之详略不同，多缘于其著述内容及体例，前传缘“诗”而立，后传因“史”而成。例如方文，虽然是明清之际桐城文学大家，也被《耆旧传》列为主传，但毕竟身逢乱世，以诸生名天下，所以其传甚简。而作为诗人，其名震当时，衣被后世，相形之下，《桐旧集》收其诗多(69首)，传记亦详尽。其引录文献有郑方坤《诗人小传》、吴德旋《闻见录》、王士禛《池北偶谈》、《渔洋诗话》、《居易录》、《分甘馀话》、施闰章《龠山游草序》、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李调元《雨村诗话》以及《感旧集》、《宜田汇稿》等相关记载约一千五百字。而观后传所记不足二百字，其中主要事迹，即“尝自命生命壬子，命画师作《四壬子图》，中陶渊明，次杜子美、白乐天，皆高座，而已呈诗卷伛偻于前。其诗任性灵，虽民谣里谚、途巷琐事，皆以入诗”一段文字，即取自前传所录王士禛《池北偶谈》、施闰章《龠山游草序》^③，余则皆略去不取。

(三)前传记述略而后传详者，如方克、方大镇、方中通、方中德、方式济、方苞、方维甸等人物传。例如方苞被奉为“桐城三祖”之首，也是桐城古文“义法”的创说人，所以出于桐城文学(古文)中心思想，后传对其记述极为详尽。通观《耆旧传》，传文详者大多也仅千馀字，而其《方望溪先生传》^④则近三千字的记述，堪称全书之最。其于方苞家世、科举、职官、交游、阅历、治学、为人、著述、影响等，既条分缕析，又描述生动。如记述方氏平生习“三礼”之学，治经

①《桐旧集》卷一《方孔炤传》。

②《桐城耆旧传》卷五《方巡抚传第四十七》。

③《桐旧集》卷一《方文传》引王士禛《池北偶谈》：“龠山以己壬子生，命画师作《四壬子图》，中为陶渊明，次杜子美，次白乐天，皆高座，而已伛偻于前，呈其诗卷。”又引施闰章《龠山游草序》：“尔止为诗，虽民谣里谚，途巷琐事，皆可引用，兴会所属，冲口成篇。”

④《桐城耆旧传》卷八《方望溪先生传第八十七》。

而躬行之事：“尤究心《春秋》、《三礼》。以谓：‘礼者，先王磨礲德性，而起教于微妙，使人益深于人道……’笃于伦纪，其立身一依《礼经》；遇忌日必废食，遭期功丧，必准古礼宿外寝。以弟椒涂亡，病未视敛，终身恨之。且卒，遗命袒右臂自罚。”由于记述方苞的史料甚多，所以此传取资亦广。相比之下，前传仅引沈廷芳《望溪先生传》、《四库简明书目》、《昭代名人尺牍小传》、方世举《兰丛诗话》、李调元《雨村诗话》等数则材料，于方氏生平事迹的记述较为简略。究其因，在于《桐旧》为诗集，而方苞不善为诗，曾于《麝青山人诗序》中自谓幼承父训“毋以为也”，会“耗少壮有用之心力”，所以“遂绝意于诗”^①，故其被选诗少而记述略。

（四）前传有记述而后传从略者，如方玺、方效、方育盛、方帜、方正璠、方正璆等人物传。此类与下一类人物，在后传中均列在“附传”，仅著明家世承继而已，而前传则有所介绍。例如方玺，前传载：“字与节，自称一得老人，处士，有《一得稿》。”后附方学渐《迩训》：“老人正身率物，表率乡间，建晚翠轩，赋诗自娱。年八十，屡宾于乡不出。”后传仅附方向传，著录兄弟三人“皆贤”，即：“长曰玺，字与节；次曰舟，字与济；次即公（向）。”又如方帜，即方苞祖父，方象乾之子。因有诗，前传颇有记述。传谓：“字汉树，号马溪，廩贡生，官芜湖训导。”引录方苞《大父马溪府君墓志》文以明其生平事迹。后传则附主传《方太仆（大美）传》之次传《方象乾传》后：“子帜，芜湖训导。”相比之下，前传因“诗”传“人”，对桐城乡邑文献辑录广泛，较后传有更多的参考价值。

（五）两传立传而记述皆略者，如方戡、方观永、方兆及、方曾祐等人物传。例如方戡，前传仅载“字周臣，象乾子，顺治丁酉举人，早卒”语，并无引录文献；后传附《方象乾传》，亦仅“戡，顺治十四年举人”一语。这类人物两传皆简的原因，一在诗作甚少，故前传从略（如方戡选诗一首，方观永选诗两首），一在对桐城学术影响甚微，或受前辈荫庇而享名（如方戡），或因后辈而享尊（如方兆及）^②，故两传皆略。

上列五种现象，在方姓之外一如其例，尤其是前三种，充分表现了两书间的承续与补益。而从两书大量的相同点来看，《桐旧集》保留桐城乡邑文献之时代性（从明正、嘉到清嘉、道）与丰富性（收录人物多、辑录文献广），均彰显其重要的文献价值。然此书素为学界忽略，尤其是桐城乡贤著述亦很少提及，其间原因多多，包括其编成后即遭“癸丑”之乱毁板，桐城民间藏书又居为奇货，所见甚罕，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我想还是桐城学术所倡导之古文传统对诗歌（包括诗集）的排斥与压抑。早在清初潘江编桐城诗集《龙眠风雅》，

^①按：《桐旧集》卷三《方苞传》引姚鼐语：“方侍郎苞少尝作诗以视查公慎行。查曰：‘君诗不能佳，徒夺为文力，不如专为文。’自是未尝作诗。”此方苞不为诗又一说。

^②方兆及，方式济祖，《耆旧传》附见《方溼源（式济）传》：“祖讳兆及，字子诒，号蛟峰，顺治十一年举人，山东备兵金事。”

卷首载有吴道新、汤日父作于康熙十六年的《序》文已为桐城诗学张目。其云：“吾乡方明善……撰《迩训》诸书，桐先哲之芳规懿迹，灿然彪炳。予惜其未附以诗文……若诗文之遴梓，可以萃众甫而播之广远也。文又不若诗之怡悦性情，尤易徵而可勒之金石、被之弦歌也。”尽管有此论述，桐城学人总是标榜古文，如方苞就视诗歌为小道，萧穆编纂《桐城文徵》、方宗诚编纂《桐城文录》、马其昶继编《桐城古文集略》并撰《序目》一卷，均标举桐城古文之地位，作为乡邑诗总集的《桐旧集》命运之沉浮，正与此学术传统的兴衰相系。而《桐旧集》文本在桐城乡间一直流传，马家藏书丰富，且有心于乡邑文献的搜集与整理，马其昶编《耆旧传》时对终成于其先伯祖马树华的这部诗总集以及诗传中包含的大量乡邑文献，宜有取资而竟未提及，是令人悬感而质疑的。

作者工作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